

搞好四川三年调整规划*

一九七九年八月十日

在抓好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同时，从省委开始，各级都要把三年调整很好研究一下，这也是下半年工作安排中的一个重要问题。这三年的工作，不是单纯的调整，而是要全面贯彻八字方针：调整、改革、整顿、提高，把国民经济逐步纳入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度发展的轨道。这是积极的，不是消极的。打好这个战役，对我省今后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。三年怎么搞，要有个设想，有个蓝图。我们四川经过三年调整究竟要达到什么要求，如何根据我省的情况搞得更好一些，需要很好研究。

我们有个总的想法，在三年调整中，就全国来讲是有上有下，在调整中前进，四川能不能比全国的步子快一些？这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特殊本事，要提更高的要求，而是因为四川的条件不同。我们四川是在怎样条件下进行调整呢？一方面我们同样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，另一方面是我们工业的潜力很大。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开始，十多年来，国家进行大三线建设，在四川大量投资，长期以来生产能力没有很好发挥，后来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又严重干扰破坏，弄得好多企业停工停产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我省工业生产恢复发展得比较快，上升幅度比全国大，一九七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，七八年又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五，这同原来生产水平低，潜力很大是分不开的。直到现在，我们工业水平仍然相当低，同上海等先进省市相比，有很大差距。去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产值，上

* 这是赵紫阳在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的地、市、县委书记会议上总结讲话的第二部分，传达学习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精神，研究制定四川三年调整规划的问题。

海是二百八十多元，全国平均是一百零三元，而我省只有六十五元。当然也有的企业好一些，但从总体来看，管理落后，技术落后，劳动生产率很低，消耗很大的情况，仍然普遍存在。这就说明，我们的潜力还远远没有挖到尽头。因此今后三年每年增长的速度，就应当比全国要高些，高多少可以研究，例如，工业能否以每年百分之十二左右的速度递增？能否经过今后三年继续努力，使工业生产达到那时全国的平均水平？要做到这一点，需要解决哪些问题，包括电力、天然气、燃料、交通这些薄弱环节怎么搞上去？这些问题，都可以虚实结合，好好务一务。

研究三年调整的问题，不要按老办法，提数字，各部门一凑就算是规划，而要认真研究我省的情况，分析我们的特点，特别是找出优势在什么地方，薄弱环节又在什么地方。再一个是不能就事论事，要研究经济思想、方针、政策问题，这很重要。一定要把研究调整同改革结合起来，解放思想，从我省省情出发，虚实结合，才能制定出一个好的规划。

根据这次会上已经提出的意见，看来在三年调整中，从指导思想、指导方针来讲，要重视这么一些问题：（一）农业结构问题，就是要在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，突出抓多种经营，特别是发展林业、畜牧业；（二）工业结构，要突出抓轻纺工业；（三）搞好现有企业的挖潜、革新、改造，依靠企业扩大再生产，加快工业发展的速度；（四）所有制结构问题，要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；（五）打开门户，发展外贸，增加出口，搞好技术引进；（六）调动军工企业生产民品的积极性，实行平战结合、军民结合；（七）搞好计划生育，控制人口增长；（八）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。还有加强科学研究工作，多出科研成果，提高干部、工人、农民的科学文化技术水平，也是很迫切的问题。这些方面的问题，如果能够很好的解决，我省的建设步伐就会大大加快，整个经济工作的面貌就会发生显著变化。

上述八个方面的问题，还有待我们大家去深入研究。这里，我只就经济结构问题，所有制结构问题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讲一些看法。

一、关于经济结构问题

三年调整中，我们要认真研究经济结构的问题，通过调整，逐步改变

原有的结构，向合理的经济结构过渡。

首先讲农业，我省农业的路子怎么走，如何从单一搞粮食逐步过渡到粮食和多种经营并举，农、林、牧综合发展，这是我省农业结构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。

我们要改变认为搞农业就是单纯搞粮食的传统观念，在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，要搞钱，搞多种经营，使生产队和社员逐步富裕起来。我省的特点是人多耕地少，但山多丘陵多，人平耕地虽然只有一亩，宜林宜牧的山地丘陵却在人均三、四亩以上。因地制宜地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，发展多种经营；搞林业，搞畜牧业，是大有文章可做的。粮食生产我们一点也不能放松，要继续大抓。但不能靠扩大多少面积，而是要着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。通过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实行科学种田，在好田好土上下功夫，使粮食每年增产百分之二、三或者更多一些，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这样稳步前进，就可以腾出手来发展多种经营。实践证明，在那些陡坡薄土上种粮食，费力不讨好，不能摆脱贫困，如果停耕还林、还牧，改变毁林开荒和种粮食“满山青”的搞法，改种林木、果树、牧草，就能够充分利用地力，大大增加收入。在因地制宜、发展多种经营的问题上，我们应当解放思想，更放开一些，限制少一些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。比如今后新开发的地区，就要考虑适合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；一些历来贫瘠的地区，种粮食低而不稳，但适合发展畜牧、经济作物或种林木，也要考虑有计划地改变过来；在粮食征购任务一定几年不变的基础上，应允许地县和区社多发展一些适合本地种植的经济价值高的作物。这样，因地制宜，搞些生财之道，才能使社队越搞越富。

在发展多种经营中，除了狠抓发展林业，继续发展蚕桑、水果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外，要突出抓畜牧业，这是带有战略性的事情。畜牧业对发展轻工，增加社队收入；对改变食物构成，增强人民体质，作用都很大。我省不仅三州有两亿多亩草原，是良好的畜牧业基地，而且全省的广大山区、丘陵，气温较高，雨水较多，也宜于发展牧草，繁殖牲畜。现在全省有猪四千六百万头，牛九百零五万头，羊一千零三十万头，牛、羊太少了，质量也差。今后除继续养好猪外，要大力提倡养牛、养羊、养兔、养家禽，不仅发展肉牛、肉羊，而且发展奶牛、奶山羊。现在对畜牧业、林业认识

不足的问题，要引起各级党委注意，要把发展畜牧业列入议事日程，地、县、区、社党委书记要下功夫在这个新的领域内认真钻研、摸索。省委决定，阿坝州和甘孜州在生产方针上，应明确以牧为主，农、林、牧结合，州委的主要精力要放在畜牧业上。这两个州，粮食不要强调自给自足，今后每年调拨给两州的粮食，按现有水平不减。在依靠社队发展集体畜牧业的同时，应鼓励和支持社员饲养好自留畜。畜牧业发展得如何，不应当以存栏数为标志，而立当看出出栏率，看每年提供的商品量。单纯强调饲养头数，三条牛的草五条牛吃，徒然拖长饲养时间，浪费饲料，很不经济。为了扶植畜牧业的发展，在畜种改良、牧草更新、草场建设、饲料加工、疫病防治、肉奶的冷藏、运输等方面，都要采取相应的措施，使之尽快落实。特别是要重视食品工业问题，这几年世界上食品工业发展很快，名堂很多，如速冻、脱水、方便食品等。要发展畜牧业，食品工业不跟上是不行的。希望各地委把丘陵、山区发展牧业的问题好好研究一下，看哪些问题自己可以解决，哪些要上面解决，省委再汇总研究，搞出几条措施来。

改变经济结构，农业要突出抓多种经营，工业要突出抓轻纺工业。多种经营上去了，轻纺工业就有了充足的原料；轻纺工业发展起来，才能把原料加工成适销商品，改变我们只供应原料和初级产品，弄到上海、武汉等地加工的落后状况，才能为我省建设积累更多资金。多年来，我省轻纺工业发展不快，在工业结构中是一条短腿，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情况越来越突出，从一九五七年到七八年，全省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，由百分之六十三点二，下降为百分之四十三点二，一九七八年轻工产值全省人平仅九十五点三元，比全国人平一百八十八点四元低一半。轻工产品质量差，品种花色单调，满足不了人民生活需要，在国际、国内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。如果不把轻纺工业搞上去，我们在市场供应、人民生活、外贸出口、资金积累等方面遇到的矛盾都不好解决，整个工业发展的速度是快不了的。

轻纺工业具有投资小，见效快，就业多，利润大的特点，我省又有丰富的资源和相当规模的基础。发展轻纺工业，广大群众和地、县积极性都很高，问题在于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有力的措施，狠抓落实。杜星垣同志设想，今后对轻纺的投资，包括中央和省给的，以及折旧费，每年能有两亿元，加上再搞点贷款，用来扩大再生产，这个意见我赞成。搞三年

调整规划时，努力按这样安排，三五年时间就可以搞上去。整个轻工战线，包括了一轻、二轻、商办工业，以及街道工业、社队工业的一部分。我们对上述各类轻工企业都要重视并给以扶持，从投资、设备、信贷、税收、产供销衔接、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，作出一些具体规定，帮助他们解决问题。地方发展轻纺工业，要考虑一般不要再新起摊子，就在原有企业的基础上，采取“滚雪球”的办法逐步扩大。如果原来没有，需要新建时，应着重发展集体所有制的企业。要引进一些专利和设备，解决丝绸、棉布后处理，皮革鞣制等技术问题，把骨干商品的质量迅速搞上去。

二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结构问题

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现在有两种所有制：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。过去认为城镇集体所有制比全民所有制低一等，加以很多限制，这是不对的。它同全民所有制一样，同样是社会主义经济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一种所有制是否优越，不能从名义上看，从形式上看，而要看实际效果，看能否推动生产力发展。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具有独立核算，自负盈亏，小型多样，适应性强，有较大的自主权，职工的个人利益同企业的集体利益有直接联系等显著特点，最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性质，能够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，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。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虽然各有千秋，但集体所有制在经营管理上有不少独到之处。现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在管理上最大的问题是“铁饭碗”、“大锅饭”，失去了企业内部的经济动力。集体所有制企业就避免了这种弊病，企业和职工有争取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和责任心。它的管理方法和分配方法，很值得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改革时学习和借鉴。经过改革，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也要逐步做到真正独立核算，自负盈亏。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，还能根据市场的变化和消费者的需要，灵活地调整自己的生产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它是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在一起的，我们进行经济改革时也可以总结推广这方面的经验。总之，集体所有制有很大的优越性，有很强的生命力，有广阔的前途。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，不是权宜之计，而是加快四化建设的一个根本性措施。特别是对发展地方工业来说，指导思想上有两条很重要：一是挖潜、革新、改造，依靠企业去扩大再生产；二是重视城镇集体所有制。把这两条搞好，那就搞

活了，就能多快好省地发展。

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，当前要着重解决认识问题、政策问题、领导问题。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到集体所有制的地位和作用，政治上要与全民所有制一视同仁，不能歧视。在经济上，不应像过去对待私营企业那样加以限制，而应当同对待全民所有制一样，扶持其发展。在工资待遇上，要破除集体不能高于全民的框框。有关贷款、税收、利润留成、干部管理等问题，省级各有关部门要继续调查研究，提出建议，准备由省革委制定一个有关城镇集体所有制的政策、方针、措施的文件，以进一步调动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积极性，促进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。

三、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

在三年中，我们不仅要调整好经济结构，解决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，而且要对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坚决地有步骤地实行全面改革。去年下半年，我们在六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，今年又扩大到一百个企业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但这还属于小改小革的范围。中央决定，明年在我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，不仅是财政体制，还包括物资体制、计划体制，包括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内容，实际上，是在四川进行整个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试点。这个任务是很繁重的。中央财委组织的调查组，即将来我省调查研究经济管理体制、经济结构、引进技术设备等重大政策问题。我们要在中央领导下，积极搞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，把自下而上的改革同自上而下的改革结合起来进行。就是说，一方面要先在一批企业试点，范围一步步扩大，内容一年年丰富，由小改到中改，再到大改，从实践中摸索经验；另一方面，系统地开展调查研究，提出全面改革的方案，经过中央批准，制定经济立法，然后颁布实行。这样，就可以使改革工作能够有步骤地稳妥地前进。

在试点工作中，以及整个经济改革中，我们的着眼点，是要把企业搞活，扩大它的自主权，更多地依靠企业自身力量扩大再生产。过去我们长期的做法，是统收统支，把企业的钱一层一层收起来，再一层一层拨下去，定项目，搞基建，搞扩大再生产。完全采取这个搞法，是使经济建设少慢

差费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有同志讲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，我们用这个办法，生产发展的速度不是很快吗？的确，当时那样搞是完全必要的，因为那时全国工业很少，需要根据统一的布局，由中央集中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来搞一系列大的项目，就是当时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；而且当时还有大量的私营企业、个体手工业，也有的是公私合营企业、合作社，市场调节还起着很大的作用。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，再去采用“一五”期间的办法就不行了。当然，关系国家经济命脉，影响全局，影响地区生产力配置的重大项目，如铁路、港口、航空、电力、石油天然气、重要的钢铁厂、邮电等方面，今后还应当是由中央直接投资来建设。但大量的地方工业、轻纺工业要扩大再生产，就应当更多地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，要把相当一部分利润留给企业，作为发展基金，并提高设备折旧率，使企业有能力根据实际需要去扩大再生产。例如川棉，改变利润全部上交的办法后，利用他们提留的企业基金加上银行贷款，就使生产能力迅速提高，今年利润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，明年的利润将翻一番。把这条路子走通，对加快四化的进程有深远的意义。

扩大企业的自主权，从实质上讲，就是扩大职工管理企业事务的自主权，使广大职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。毛主席对工人参加管理，依靠群众办工业有很多论述。但我们执行得并不好，其原因，一是忽视了物质利益原则，企业搞得好坏，同企业和职工的切身利益没有挂钩；二是企业本身没有多少自主权，工人参加管理、发扬民主，也就是空的，只能对干部作风、生活福利提点意见。在改革中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，工人参加管理就有了真正的内容，就会有很大的活力。实践说明，要把工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，并使之持久下去，需要解决三个问题：物质利益问题、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和民主管理问题，三者缺一不可。要真正发挥工人当家作主的权力，企业的大事，如生产计划、财务收支、企业基金的使用、生活福利等，都要由工人讨论决定。除了职工代表大会以外，工人参加管理还可以采取哪些形式，要在实践中摸索、创造。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，光有工会不够，要有工人参加管理的经常性活动，可以组织一些委员会或者小组，来负责贯彻职工代表大会决定了要办的重大事项。比如，职工代表大会决定拨多少钱盖职工宿舍，就组织一个委员会来管这笔钱，负责盖房子，分房

子。南斯拉夫企业自治、工人自治的办法，我们不能完全照搬，但属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那部分权力，应当由工人来管理，在这个范围内由工人自主。工厂基层干部的民主选举问题，过去有些同志担心，怕选出一些老好人。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后，情况就不同了，重钢权力下放后，工人选出的基层干部，大都是那些懂业务、有文化，会管理，身强力壮，能领导大家带头干的人。因为不再是吃“大锅饭”了，只有选出好的领导，生产才能上去，工人的物质利益才有保证。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，真正搞好民主管理就更有条件，更有必要了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群策群力，办好企业。

改革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，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。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，把企业的产供销，与市场联系起来。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，需要改变现行的价格体制、价格政策，打破传统的流通体制和渠道，这有待于今后去摸索。过去行政区划、行政部门把企业束缚得很紧，一切事情都要通过条条和块块，形成条块切割，使企业之间相互的经济联系被割断了，这对生产发展是很不利的。今后要逐步扩大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，试点企业与试点企业之间，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之间，都可以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，建立直接的经济联系，如订立经济合同，产销结合，以至在生产上相互合作，经济上相互渗透。这个问题很复杂，阻力很大，现行体制是不允许的，但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企业永远不能真正活起来。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，有产供销的联系，也有财务上的联系，可以相互投资，可以合营。如泸天化今年提留的企业基金有一千万元，就可以投资到轻纺工业方面，与有关企业联合办厂，实行利润分成。这种经济联系也应纳入试点内容，通过试点企业带动面上企业，并为进行全面改革积累经验。

坚持安定团结 集中精力搞四化^{*}

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

一、对当前工作的看法

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的形势是好的。

但现在仍然矛盾很多，问题很多。

归根结底是坚持安定团结，集中力量搞四化。离开这两方面，问题解决不了。

集中力量搞四化，没有安定团结不行。而要保持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，归根结底要把经济搞上去。

二、安定团结是大局

具体政策措施和宣传工作要从这个大局出发，服务这个大局。

(一) 上访问题

最近各地上访激增，西安由二、三十人增加到一千二百人，有的闹得很凶，占了信访室。山东到青海支边的 600 多人起来闹，要求回山东，补发 13 年工资，分到大城市。问题不能解决就游行，甚至准备冲监狱。

对上访人员的情况要具体分析：一部分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，按政策应该解决的；有些坚持不合理的要求，甚至无理取闹的；相当一部分反映的问题虽有一定道理，但按现行政策解决不了。43 号文是正确的，仍要继续

* 这是赵紫阳在十一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提纲，强调要坚持安定团结、集中精力搞四化的指导思想。

续贯彻。这方面的口子不能开，否则引起连锁反应，会带来许多问题。

（二）反特权问题

现在反官僚主义、反特权问题上，有股风不大正，好像已经形成了特权阶层。当然，官僚主义、特殊化问题是有的，有些还很不像话，纪律检查要抓，要解决。问题是对党的整个状况如何估计？把这个问题摆在什么位置上，采取什么办法解决？把人们的心思引导到什么上面去？是引导去搞“四化”，还是引导去反特权，矛头引向各级党的领导？如果那样，反而会涣散人心，现在群众最大的要求是把经济搞上去，不要来回再折腾。为什么特权化的问题很引起群众气愤？因为群众的生活水平太低，还是要靠大家把经济搞上去才行。

（三）公开宣传要谨慎

如上访问题发的《把好事做到底》等文章，讲上访者大都有冤情，下面党委顶着不办。有的地方落实政策名不符实，这些不符合实际；讲中央派了很多人下去，上访的人就认为地方党委不可靠，要找中央的“包青天”才解决问题。报上登鲁大东（四川省长）接见群众，上访人都点名要找鲁大东。这些事要做，但不必那样宣传。

（四）公安部门要敢于维护“三个秩序”（生产秩序、工作秩序、社会秩序）。现在公安部门存在对破坏“三个秩序”不大敢管的现象。

要立些章法，维护“三个秩序”。

（五）要反对两种倾向

当前主要是要继续批判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极左路线，反对左的思想倾向，同时注意右的倾向，这两种倾向都是反对党的正确领导的，都是动乱的因素，二者有时合流。

既要警惕打着“高举”的旗号反对三中全会精神，又要警惕打着民主的旗号搞“自由化”。

小平同志说：现在有的从左的方面，也有的从右的方面，来助长无政府主义，搞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。两个方面都值得注意。

三、集中力量抓经济工作

完全拥护陈云同志的讲话。

(一) 对经济方面的问题要看够。

农业问题清楚了，政策对头，很快转过来，会一步步好起来。工业方面的矛盾还没有理清，多年积累下来的比例失调，使我们受到了惩罚。

(二) 调整要下决心。

小的调整不行，要彻底的实事求是，不怕动筋动骨，坚决压缩建设战线。

国家投资集中去办电力、交通、港口等急需建设项目。

(三) 基建要坚决下。

生产要保持一定速度，尽可能快一点，这就需要把经济搞活。

(四) 四川 100 个工业企业扩权试点效果是好的。

上缴财政是增加的，财政部有顾虑也可以，但方法不对，说是企业增加收入，国家减少收入，这不符合实际。

粮食生产不可能每年上的幅度那么大，农业要上去哪有那么简单。在人口增长率降下来的情况下，每年增产百分之几就很好。因为一则不可能投资那么多，工业支持农业力量有限；二则不能扩大耕地，相反有的还要退耕还林、还牧，才能把牧业、林业发展起来。

宁夏、甘肃、云南提出，为了全面发展农业、林业、畜牧业，要求中央在生产上予以支援（调进粮食或减少征购。）

(五) 三年调整期间，国家财力有限。

对于一些地方型的小型建设项目、如小化肥、小水利、畜业设施，旅游设施等，这些项目是当年急需的，可采取无息或低息贷款办法解决。

(六) 要把经济搞上去，关键在于党的领导要真正集中抓四化建设上来。

从政治局到各级党委部要把改革经济工作拿在自己手上。要深入调查研究，摸清情况，把情况摸准了就早下决心，做到情况明、决心大、方法对。三年时间一晃而过，现在时间十分紧迫，稍不抓紧，就可能贻误战机。在经济工作中，在发扬民主基础上，该集中的要集中，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分散主义。

经济工作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^{*}

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日

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之后，紧接着，中央召开了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，邓小平同志十月四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，中心是讲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上的问题，强调了经济工作是最大的政治问题，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这样一个思想。这个指导思想，对我们认识问题，搞好工作非常重要。

邓小平同志说：不单是明年，恐怕以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。别的事情做差一点不要紧，不打屁股，这件事办不好，要打屁股。以后主要搞这个事搞。所谓政治，目前就是四个现代化。他讲：经济工作，经济问题，现在是最大的政治问题，说得更准确一点，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。解决现在碰到的许多政治问题、社会问题，都要从经济工作着手。他举了很多例子。我们现在问题很多，落实政策还有些尾巴，还要处理就业的问题，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市的问题，人民的生活、福利、工资问题等等，积压的很多。这里面有一些是政治问题，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。经济不发展，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。所谓政策，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。例如解决城镇就业，搞集体所有制，还不是经济的办法？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。有很多的问题都涉及到经济方面。还有别的事情，例如思想路线要深入讨论，也不能离开经济工作，离开抓生产。

^{*} 这是赵紫阳在四川省、地、州、县委书记会议上传达中央召开的省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精神的第一部分。新华社《内部参考》89期（1979年11月2日）曾刊登。

发展科学、教育，也是经济问题，四个现代化的问题。这些工作不能搞运动，要插到经常工作，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。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，结合实际来讨论恐怕效果好一点，免得搞形式主义。解放思想，归根结底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把四化搞上去。以前我们讲过，解放思想要围绕四化去解放，要服务于四化，不能妨碍四化。如果不联系四化的实际，孤立地搞解放思想，搞来搞去，在概念上打圈子，搞不好会搞成形式主义。小平同志说，例如一个生产队，完全应该结合实际来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，就是这个生产队怎样提高自己的生产力，发展自己的生产力，怎样利用每一个山头，每一个水面，每一块耕地，每一个边角。这样讨论，解放思想的效果会好得多。每个工厂也应该这样。他说他看了个材料，有一个工厂采取了有利于改善职工生活的十三条措施，利用本厂的条件，不用很多投资。他讲的大概是自贡那个厂。这个厂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单位，试点以后，它有了自己的企业基金，根据群众的意见，就办了多年来群众要求办而又无力办的事情，主要是福利，托儿所、食堂、厕所、洗澡堂等十三件。邓副主席很欣赏这个材料。这个问题，如果不围绕四化，从体制改革，扩大企业的自主权，把生产搞上去，然后分到一点企业基金去解决，而光是靠闹，是解决不了的。没有钱，再闹也不行。现在，我看就有这种苗头，不问国家有多少力量，不问是否可能，就是在福利上提要求。你说要求高吗？不是。不应该吗？也不是。问题就是没有力量搞，只有把精力放在生产上，首先把生产搞上去，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去解决这些问题。离开生产，越闹越解决不了，因为问题的产生，归根结底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干扰了十多年，造成比例失调而带来的恶果。小平同志说，一个工厂，如何发展生产，如何使自己的品种质量提高，如何改革自己的经营管理方法，如何打开市场，如何解决职工的困难，如何避免走后门，解决这些问题，就是真正解放思想。现在提倡一种方法，就是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，把解放思想，放到每一个生产队，每一个工厂，每一个学校，具体地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。我们过去搞的运动，如学理论，学来学去，就是不结合实际，结果大家厌烦了，打扑克、聊天。小平同志说，现在讲干部路线、组织路线，特别是选择接班人，这些问题也应该是放到经常工作里面去解决，选拔接班人就不能搞运动。总之，我们要集中抓的

是经济工作，其他的事情围绕这个去搞，放在这个工作里面去搞。

根据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，我们在北京开会中间议论到一些问题，最近省委也作了讨论。现在讲一下省委的一些看法。

现在我们国家确实问题很多，矛盾很多，人民中间确实有某些困难，这是事实。但是这些问题究竟怎样解决，怎么才能解决，什么是主要矛盾，抓住什么问题才能使很多问题逐步得到解决？在这个问题上，党内认识并不完全一致，我们认为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把经济、把生产搞上去，只有这样，其他问题才有可能逐步得到解决。很多问题，归根结底都牵涉到一个经济问题，国家财力的问题。这主要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干扰破坏十多年，造成比例严重失调，经济走上崩溃边缘所遗留下来的。例如，人民生活困难，具体讲，一件一件讲，都应该解决，可是这些事加在一起，现在就没有可能解决，如果我们抓得不对头，不集中力量把生产搞上去，不仅问题不能解决，甚至问题还会越搞越多，越来越困难。三中全会以后，无论农村、城市，基本的形势都很好，我们的潜力也确实很大。只要我们全党集中力量，按照三中全会的方针办，同心同德、聚精会神搞四化，这些问题是能逐步得到解决的。但是，对于同心同德、聚精会神搞四化这一点，全党是不是思想一致呢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要抓住现在这个大好时机，尽快地搞上去，首先还是要使同心同德、聚精会神搞四化这个思想深入人心，真正取得认识上的统一。现在看，对待政治路线口头上大家都赞成，行动起来，还并不那么一致，无政府主义、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还相当严重，这样能够集中力量搞四化吗？要在政治路线上真正取得全党的一致，首先和主要是继续批判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极左路线的问题，也有一个纠正无政府主义、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化的问题。如果大家不顾四化这个大局，离开这个大局讲个人问题，讲局部利益，这样不会有好结果的。这样下去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就会把时机再耽误了。我们现在的情况比一九六一、六二年不知要好多少，但是我们今天党的威信没有过去那么高，党内思想也不像那时候那么一致，不是全党一个劲克服困难那种情况，有些人打着“民主”的旗帜来争个人利益，争局部利益，这样下去没有希望。党中央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三令五申，首先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，不久又提出“同心同德”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后又加了个“聚精会神”，不外乎就是要

把全党的注意力、全党的思想集中到搞四化上，把生产搞上去，其他都要围绕这个，服从这个，但是看来还很不容易，干扰还是相当的多。小平同志讲四化是最大的政治，是压倒一切的政治，把所有的词都用上了。这就是表达中央搞四化的决心，是为了使大家能够真正领会这个思想，把全党对政治路线的认识真正统一到三中全会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和叶副主席讲话的精神上来。

中央提出工作重点转移以来，我们是在转，但是很吃力，干扰很多，思想和精力不那么集中，节外生枝的事不少。例如上访问题，现在全国是高潮，四川比今年三月以前还厉害。北京最近天天游行不断，“民主墙”相当活跃，有的大字报我看就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。什么游行啰、请愿啰、静坐啰，等等，当然宪法还是允许的。这些东西不能不影响社会政治的安定，牵制领导的精力，群众非常厌恶这些东西。有些地方，矛盾似乎还在向激化方面发展，甚至出现了冲击领导机关，围攻、殴打接待人员，串连，聚众闹事，建立非法组织等等混乱现象。工作秩序、社会秩序、生产秩序，还有交通秩序、学校的教学秩序，在有些地方受到影响，动不动就搞大民主，闹事，这个势头越来越大。

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？为什么干扰这么多？我们应当怎么看，怎么对待？省委联系我省的情况作了研究，分析了这样几个问题，几个原因。

首先，要看到人民中间确实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和困难，有一些意见。这里面有些问题确实是按照现行政策应当解决，没有认真解决的；有些是可以解决，而没有尽力去解决。比如，我们接触到的到省上访的人员中，确有一部分人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。有些机关把案子搞错了，有文化大革命前的案子，也有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案子，由于自己过去直接处理过，就拖着不解决，或不彻底解决。我这里打个招呼，这些应当解决而还没有解决的问题，要按照政策规定认真负责地给以解决，不能有任何抵触情绪。特别是有些政治上完全搞错了的，还没有给人家彻底平反，还要留尾巴，硬说处理是正确的，这样我们就输理。最近省、地、县都采取了一些措施，我们应当非常严肃、非常负责地解决这些问题。特别是政治上冤、假、错案的平反、改正，包括过去错判了刑的，要尽快解决。人家要求解决，不能说是干扰，这是我们完全应当做好的工作。这个工作不做好，就会失去

社会同情，也说明我们的思想政治路线还没有端正。为什么搞错了不给人家平反呢？这不是极左思想作怪、坚持极左思想吗？在生活福利方面，也有一些问题，在我们目前的经济条件下，要想搞很多、搞得很好是不现实的，但应当把工作做到，能做的事情都应当做，哪怕是一些小的改善。我们是不是存在着对人民生活不够关心的地方？比如食堂、托儿所等，我看机关、学校、工厂都有这个问题。听说北京有个大学的学生最近贴大字报要求解决福利方面的问题，说要上街，校党委就星夜开会，全部答应。这说明党委还是可以解决的。既然如此，早点解决不好吗？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主动解决，尽力而为，群众就觉得党委还是关心群众的。能够解决而不解决，群众一闹才解决，那就被动了，而且还产生副作用，认为不闹不解决问题。总之，一个落实政策的问题，一个人民生活福利的问题，确实有应该解决又可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情况。各单位要进行检查，存在这样的问题就应当主动解决。我们要相信群众，应该做又能够做的事情做到了，群众就会满意。坏人想挑动也挑动不起来，即使挑动起来，处理也比较好办。

另外，由于多年来经济发展缓慢，比例失调，群众的生活、工资、就业等等有一大批问题，确实有很多实际困难，这是我们应当理解和同情的，但是今天无力解决。这个量比较大。从局部，从个人看，好像不解决很难讲，但从全局看，又实在解决不了。这个问题不能归咎于现在的党委，现在的领导人，而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长期破坏，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后果。现在我们的科研单位、学校、机关、工厂，有相当一批四十岁左右的人，他们是各方面的骨干。夫妇两个，加上两、三个孩子，再养一个老人，六、七个人吃饭，两个人工资加在一起一百块钱左右，有些物价又涨了，而且机关、学校又没有奖金，生活实在是困难。这个问题大家都很焦虑，应该同情。照我看，总是要解决的，但现在一下还办不到。同志们知道，去年首先解决农产品提价，把农民稳下来，再加上对越自卫反击战，今年还盖了一点房子，工资做了一点调整，就这几笔账一算，明年的基本建设就要大大地压下来。多年来比例失调，一直欠账很多。这次算了一个账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干扰十年，全国损失了五千亿元，少了五千亿收入。如果有这五千亿元，今天的好多事情就好办得多。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困难明明摆在那里，但是只有服从大局，把生产搞上去，才能逐步得到解决。

如果离开这个大局，困难不仅不能解决，甚至会使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。如果闹起纠纷，影响生产，影响“三个秩序”，使生产上得更慢，那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就会更加拖长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共同的命运是要靠把四化搞上去，离开了这个，其他的都不可能。比如讲住房，讲学校房子，都不能孤立地提出问题，而要把一个问题放到全局里面，放到文化大革命多年来造成的后果中去看待它，否则是讲不清楚的。当然人民对我们有点不满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确实困难嘛。这就需要我们全党思想一致，去做艰巨的工作。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，要尽量地、切实负责地解决，首先是那些冤、假、错案，不要再留尾巴。所谓经济问题，福利、工资、就业等问题，我们也要尽力而为，但是这类问题，目前难于有很大的解决，“非不为也，是不能也”，不是不干，是不可能，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。如果我们生产搞好了，随着生产的发展就能逐步解决这些问题。所以，我们首先要看到人民生活确有困难，有些现在就应该解决的，要认真解决。有些确实一下子解决不了的，应当向人民做艰巨的工作，使他们了解这个情况，得到人民谅解，大家同心协力把生产搞上去。我看这是唯一正确的方针。离开这个前提，孤立地去讲福利，讲生活，讲应不应该解决，是讲不清楚的，而只能造成混乱。这是我讲的第一点，也就是造成这些问题的第一个原因。

第二，我们要足够地估计到，多年来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煽动的无政府主义、极端个人主义的流毒、影响是很深的。特别是要注意还有“四人帮”帮派势力的残余分子和少数别有用心的人，利用多年来积压下来的社会问题，利用一些人的某些不满，乘机兴风作浪，制造事端。对此我们不能低估，不可以丧失警惕。现在有的人就是打着“民主”的旗号搞自由化，打着“反官僚”的旗号搞无政府主义。在那些带头闹事、拨弄是非的人当中，就有那么一些过去是跟着“四人帮”，打着反“走资派”旗号的闹派人物，现在摇身一变，又打着“反官僚”、“争民主”的旗号来制造混乱。过去他是“造反”的，现在他还是“造反”的。反的对象没有变，反正还是反对各级党委。斗争的目的没有变，方式方法也没有变，还是大民主，搞“四人帮”那一套，拉山头，搞串连，围攻啦，游行啦，大字报啦，大字标语啦，上窜下跳，煽风点火，制造舆论。就是打的旗号变了，过去是极左的旗帜，现在大概是个极右的旗帜。过去叫喊“民主派就是走资派”，“走资派”就要打倒；

现在就提什么反“官僚”，反“特权”，要“人权”，要“民主”。他们人数虽少，能量很大，很会钻空子，造舆论，存心把形势搞乱。对这些人，我们绝不要上当，以为他是真要搞社会主义民主的，反官僚主义的，反特权的，不然要吃大亏。重庆现在就有人打着“民主”的旗号、“落实政策”的旗号，要为“十大宣传队”翻案。这很值得我们注意。

现在从我们接待的上访人员看，真正受了冤枉，需要落实政策的，相当多的还是比较安分守己，态度还是好的，讲道理的。恰恰是那一些本身并不存在落实政策问题的人，他没有道理可讲，就是在那里煽风点火，施加压力，挑动、扩大事态，煽动别人来搞，以便混水摸鱼。上访是为了解决问题嘛，为什么要搞大民主，要上街呢？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？大民主是对待敌人的嘛。现在北京“民主墙”的温度大大地加高了，那些尖端的东西，是把矛头指向了党中央，指向了华主席，邓副主席，指向了我们整个制度的。我们这里也有一张大字报，是传抄的吧，也是很尖端的嘛。有极少数人就是利用我们各种社会问题，包括人民对生活有些意见，有些政策不够落实，想把这些人发动起来，作为他们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力量。实质是这么个问题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人，是由于受错误思潮的影响，采取了不正确的方法。这是当前出现这些问题的第二个原因。

第三，就是我们的思想工作薄弱。前面讲过，群众中有很多实际问题和困难，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他们中间，有些人认为，“四人帮”打倒了，现在还给我们解决问题，你们不是官僚主义，不关心人民生活吗？他们不了解这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长期破坏带来的后果，这个后果不是一下子完全暴露出来，更不是很短时间就能完全消除的。去前年因为刚刚打倒“四人帮”，人民中间很多问题没有提出来，掩盖着的，一到去年下半年就开始明显了。有些群众以为，“四人帮”一打倒，很快就是生产力的大发展，马上十多年的问题，甚至二、三十年来积压的问题，都可以一下子解决，那不可能嘛。就业、福利、工资、房子、生活问题，能一下完全解决吗？比如落实政策中间的许多经济问题，就一件一件来讲，好像都该解决。但把这些问题加在一起，根本无力解决。四川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，就不晓得要多少个亿。前一段我们的思想工作薄弱，没有把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理直气壮地向群众讲清楚。今天从政治上纠正过去的冤、假、错案，是完全正

确的。至于经济上的问题，补偿，退赔，基本上不能解决。过去是在搞运动的情况下搞的，不能完全拿今天的政策去衡量。一九五八年那个瞎指挥、共产风、大办食堂，拆了多少人的房子，搬了多少人的家？那都退赔得了？那个账怎么算？落实政策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案，要着重从政治上解决，很多经济问题现在不可能解决，只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整个农村、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才能解决。不从整个生产发展来考虑，那是没法子解决的。当然，对于生活确有严重困难的，可以采取救济或别的什么办法。我看今后也还只能按这个精神办。这一点，有的群众可能开始不理解、不谅解，但是耐心地讲道理，多数最后还是会同意的。

现在思想工作薄弱，报纸、广播关于这方面的东西讲得很少，讲得不全面。有一些问题，在领导机关，在报刊宣传上，认识不那么统一。比如民主和集中的关系，纪律和自由的关系，统一意志和心情舒畅的关系，叶副主席的报告和中央的历次报告都讲得很清楚。两个方面必须兼顾而不能只讲一面。民主是要发扬的，还要讲集中嘛；自由是要保障的，还要有纪律嘛；心情舒畅，还要讲个统一意志嘛。北京的新华门，这是党中央所在地，国务院所在地，就随便冲，冲了以后没事，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有这种例子，我们国家怎么能允许呢？不管你什么理由，总之这个地方不能冲嘛。最近听说有个上访的，是我们四川岳池人，十月十三号冲新华门，冲了以后爬上国旗台，要把国旗降下来，当然这个人是被拘留起来了。那天发生几百人在新华门前静坐，有几个人操纵，不准别人离开那里。这些人开口声声讲人权，他们的行为不叫侵犯人权吗？你有你的自由，人家有人家的自由嘛，你的人权不能侵犯，你可以侵犯别人的人权，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！中央采取了措施，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。党有党纪，国有国法。如果不讲集中，不讲纪律，不讲统一意志，那我们有什么战斗力，我们国家不是成了一盘散沙吗？我们的党、国家、人民不是就涣散了吗？我看不能这样子。集中同民主不能对立起来，没有集中就很难有民主，当然没有民主也不能正确地集中。没有集中，民主能有保障吗？没有纪律，能有自由吗？就像刚才我讲的，几个闹事的人就限制你的行动，你就没有自由嘛。没有统一意志，心情也舒畅不了的。如果不集中力量把四化搞上去，我看最后谁也不会心情舒畅。

还有在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上，思想也有些混乱，华主席、邓副主席多

次讲过，我们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，同时必须要有社会主义法制。否则，民主既得不到有效的保障，也不可能正确的轨道。民主只能在社会主义法制的范围内去实现。比如冲中南海，那叫民主吗？我看冲省委，冲市委、地委、县委，也不是民主。超出法制，无视法制，离开法制讲民主，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，就不可能不影响社会秩序，造成混乱。现在我们要健全法制，制定一系列法律。这些法律要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，同时要制止危害我们国家、社会，危害生产和秩序的行为。在这个意义上讲，我们的法制、法律，就是维护人民民主权利，同反革命分子、坏分子、敌对分子作斗争的武器。把法制健全起来，通过法律的形式和办法去进行这种斗争，对我们全党来讲，包括对政法部门来讲，是个新的课题。现在有的地方，对法制的理解有些问题，把法制变成了束缚我们自己手脚的东西，给坏分子、反革命分子、敌对分子大开活动方便之门，这就不对了。不要一讲法制，就发生误解，束手束脚，听任流氓、盗窃犯、强奸犯、诈骗犯，以及各种各样捣乱社会秩序的坏人胡作非为，不加制裁。我们讲法制是积极的，不是消极的。我们要用法律制裁坏人，用法制维护社会秩序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。

在所谓反官僚主义、反特权的问题上，认识也不很一致。我们认为无产阶级的执政党是要不断地克服官僚主义的，而且克服官僚主义需要人民的监督。艰苦朴素，同人民共甘苦，作人民的勤务员、人民的公仆，这是我们的本质，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，应当不断地发扬。党内确有极少数搞特权，脱离群众，官僚主义非常严重的人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、组织部门应当经常进行检查，给以严肃处理，这是非常必要的。但问题是，在我们的全部工作中，究竟把反官僚主义、反特权的问题放在什么位置上，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。官僚主义是应当克服的，特权也是要反对的，但它是不是主要矛盾？有人讲，现在广大人民同官僚的矛盾，同什么官僚阶层、特权阶层的矛盾，是主要矛盾。这个话同“四人帮”讲的“广大人民同走资派的矛盾是主要矛盾”，差别并不那么大。他们所谓官僚，也就是党委，那个走资派，也是指党委，差不多，只是口号不同就是了。究竟什么是主要矛盾？华国锋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讲得很清楚，抓住实现四化，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，而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个是主要矛盾。同时，解

决官僚主义、特殊化的问题，不应当采取大民主的方法，搞运动的方法。陈云同志讲，我们国家再也不能折腾了。大民主的苦头我们已经吃够了，这种搞法只能破坏安定团结，造成社会动乱，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。

从当前的思想动向来看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，就是把经济工作，把四化摆在什么位置上，究竟四化是我们最大的政治呢，还是民主或其他的东 西是最大的政治？有人公开讲，不赞成叶副主席的讲话，认为不能说四化是最大的政治，民主才是最大的政治。这种人这样讲，当然不奇怪，照外国人的说法，他是“持不同政见者”嘛！但他这么一讲，倒更加提醒我们注意，无论如何不能把民主摆在四化之上，不能把民主当作最大的政治，要四化服从于民主。实现四个现代化，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。国家的巩固、社会的安定、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，最终都取决于四化建设的成功，取决于生产的发展。我们的一切工作，都要围绕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，为这个中心服务。发扬民主，也正是为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、创造性，促进四化的实现。如果讲民主不是围绕四化，而是离开四化，甚至妨碍四化，那就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，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。

总起来说，现在发生这些问题，第一是群众中确实有一些实际问题和困难；第二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流毒，特别是有些帮派势力的残余在里边兴风作浪；第三就是在我们党内，包括在报刊宣传上，思想不那么一致，因此就容易起一个诱发的作用，这些问题就容易搞起来。

解决这些问题，必须要抓几个方面的工作：

第一，我们各级领导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，关心群众生活。对应该解决而又有条件解决的问题，必须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主动积极地加以解决。还没有纠正的冤、假、错案，一定要抓紧解决落实，决不允许采取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，不允许拖。如果冤、假、错案不解决，就等于帮了那些帮派势力残余和别有用心的人的忙，他们就是想借这个机会，利用这么一个因素来捣乱。现在我们国家还很困难，领导干部一定要以身作则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，不要搞特殊化，要密切联系群众，关心群众的疾苦。我们对人民的生活福利，能够解决的要尽可能去解决，工厂也好，学校也好，我前面讲了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不要等人家闹才解决。至于不应该解决的问题，再怎么闹也不能解决。过去“闹而优则

住”不行，现在闹就占便宜也不行，靠闹的办法来解决问题，我看不能同意。对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不能乱许愿，随便开口，要坚持原则做好工作。

第二，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。要把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，向群众讲清楚，提倡顾大局。今天的国家，是处在经过十年大动乱之后，就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一样，身体还很虚弱。即使有些问题应该解决，在某一方面需要动大一点的手术，也要考虑不能马上动，要保养一段。尽管药方是对的，也还有一个下药的时机问题，过急了不行，下猛药也不行。我们一定要稳步地建设民主与法制，稳妥地解决存在的问题。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，勤俭建国的作风，大家要忍受几年困难，团结一致去战胜困难。解决具体问题要和大局联系起来。集中与民主，纪律与自由，统一意志与心情舒畅，不能只顾一边，不能只讲一面。我们要克服某些思想上的混乱，统一认识，统一步伐，全心全意、聚精会神、专心致志、分秒必争地投身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去，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第三，加强法制。要维护“三个秩序”，同违法行为作斗争。我们的政法部门，一是要执法守法，二是要发挥保护人民，维护社会秩序，同反革命分子、坏分子作斗争这样一个职能作用，不能够让坏人钻空子。对煽动闹事，破坏“三个秩序”的极少数害群之马，不能放任不管，要依法严肃处理。特别是对那些乘机兴风作浪，混水摸鱼的“四人帮”帮派的残余分子，要坚决予以揭露，按照法律惩治。有一些本来是属于“四人帮”的帮派，当时因为执行扩大教育面，缩小打击面的政策，区别对待，没有搞他，或者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，现在他利用这个机会作乱，这就是说明他坚持不改，就应当新账老账一起算，加重处理。

总的来讲，当前在思想上、政治上，主要还是要继续批判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极左路线，解放思想，肃清它的流毒和影响，在批判极左路线的同时，也必须反对无政府主义、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化这种倾向，维护和发展我省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，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工作。